

# 日本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 台日經貿互動之分析

邱奕宏\*

## 綱 要

- |                         |  |
|-------------------------|--|
| 壹、前 言                   | 伍、影響日本區域經濟整合政策的<br>國內外因素               |
| 貳、近年來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的<br>立場轉變 | 一、日本國內結構性因素                            |
| 參、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的看法          | 二、國際政經與戰略環境因素                          |
| 肆、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的<br>歷程   | 陸、近年台日經貿互動概況                           |
| 一、民主黨時期的 TPP 政策         | 柒、台日 FTA 的 GTAP 模型分析                   |
| 二、自民黨時期的 TPP 政策         | 捌、結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是我<br>國經濟 產業升級的手段而非<br>目的 |

## 壹、前 言

國際貿易占我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70%以上，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與命脈。過去 70、80 年代，由於我國在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使得台灣一躍而成為眾所稱羨的亞洲四小龍之一，亦是我國經濟奇蹟的主因。

但近年來由於國際政經情勢發生巨幅變化，使得我國以往奠基在國際貿

---

\* 國立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易上的優勢逐漸消失褪色。肇因於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資訊革命所帶來的產業結構變化，不僅使得國際貿易早已超越以往跨國貨物貿易的形式，而轉變為全球跨國生產鏈的緊密結合。這也使得促進貿易便利、降低貿易障礙及保障投資等議題的經濟自由化浪潮，逐漸成為全球共同趨勢。然而，由於 WTO 多哈回合談判的停滯不前，使得各國紛紛以尋求締結雙邊或多邊的區域貿易條約，以加速經濟整合，促進貿易便捷化，進而帶動經濟發展。

特別是最近數年，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整合蔚為風潮，不僅有美國所支持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由東協加六演變而成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中」日韓三邊自貿區(China-Japan-Korea Trilateral FTA)及以拉丁美洲國家為主的太平洋聯盟(the Pacific Alliance)等發展中區域經濟整合。此外，雙邊自由貿易協議，如不久前簽訂完成的韓國及加拿大自由貿易協定，及中國大陸與南韓的自貿協定等，皆顯見區域自由貿易已儼然成為一股難以阻擋的趨勢。

日本向來為我國重要經濟夥伴，與我國有深厚的關係，且台日經濟關係互動緊密，對日本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研究，將有助於我國尋求日本對我加入相關區域經濟整合機制的支持。根據經濟部貿易局在 2012 年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概況中指出，日本為我國第五大貿易夥伴，是我國貿易入超的主要來源，達 285.3 億美元。對日本貿易占我國貿易的 11.3%、向日本出口占我國全部出口 6.3%，日本對我進口則占我國全部進口的 17.6%，是我國最大的進口來源國。由此可知台日經濟緊密程度。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自 2000 年後期以來，日本的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 FTA 政策的發展，著重於從日本國內政經因素來探討。本文透過對日本相關文獻的分析及對日本官員及學者第一手的訪談，來剖析日本之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發展歷程，以求瞭解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發展的總體思維與戰略。

此外，本文亦透過對於目前台日雙方貿易、投資及產業鏈連結的分析，

及利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對台日在不同區域經濟整合情境下對各自的經濟產業影響的研究，以探討未來在台日共同加入之後所可能產生的正面效益及產業影響。簡言之，本文嘗試透過質化與量化的分析，從日本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發展經驗，期待對我國未來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能有借鏡。

## 貳、近年來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的立場轉變

自 1990 年代初以來，日本經濟自泡沫經濟崩潰後，遂陷入長期頹靡不振的窘境，也即是所謂「失落的二十年」之長期低經濟成長的時期。近幾年來，由於 2008 年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及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國內產業及民生的重大衝擊等內外交錯的因素，使得日本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再者，由於近十年來南韓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強勢競爭，與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皆使得日本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更趨嚴格及艱困的競爭壓力。特別是中國經濟的快速興起，並於 2010 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震撼，更使得日本不得不更弦易張，來進行經濟及產業結構的調整，並從以往較為消極保守的貿易發展戰略，轉而開始採取較為大膽進取的對外經濟整合路線。

此一政策的轉變，最明顯的徵兆出現在 2010 年日本民主黨首相菅直人所開始推動的「新成長戰略」，該戰略之目的在於透過需求面來著手以挽救低迷不振的日本經濟及恢復日本國民的信心。該戰略包含七大項的戰略計畫，在其中一項的「亞洲展開國家戰略計畫」中，民主黨政府將建構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納入其中，並希望透過促進亞太區域的經濟合作來增加區域內的人員、資金及貨物的流動，以進一步深化及拓展日本在亞太市場的影響力。

在此背景下，日本在 2010 年 11 月於橫濱舉辦亞太經濟合作領袖會議(APEC Leaders' Summit)，適逢美國正積極主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並期望日本能夠在該場合發表其參與的立場表明。然而，日本政府擔心於日本農業無法承受 TPP 對農產品要求全面開放之高標準所帶來的衝擊，因而無法在當時表明其參加 TPP 的意向。

在歷經政權更換的三年後，日本政府正式於 2013 年 7 月宣布加入 TPP，而成為其第 12 名正式成員。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也積極與歐盟、土耳其等其他國家展開雙邊的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再者，日本也是數個區域經濟整合倡議的成員之一，例如日本是東協主導之整合東協加六與東協加三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的成員之一，亦是結合中國、日本及南韓的中日韓自貿區(China-Japan-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CJK FTA)的重要成員。相較於以往在簽訂 FTA 及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的保守慎重態度，日本政府近年來在此議題之立場的轉折可說是重大的轉變。

## 參、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的看法

作為全球經濟的大國，日本對於區域經濟整合的立場一向不是扮演主導者的角色，這是因為其著眼於全球市場，而非將自己限縮於區域經濟強權。因此，在全球貿易的立場上，日本政府向來以全球層次的世界自由貿易為優先，而將區域貿易協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及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置於其次。也因此，日本政府在過去以來簽訂雙邊自由貿易、或是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態度上，向來不是十分積極主動。

簡言之，日本政府在 1990 年代對 FTA 及 RTA 大體多採取消極的立場，這時期可從 1992 年歐洲簽訂馬斯垂克條約到 2002 年日本首次與外國—新加坡—簽訂 FTA 為止的此十年。在這個時期，日本政府對 FTA 大體採取懷疑及否定的態度。然而，此一政策最後之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國際因素及國內

因素所導致(閔沢洋一 2008)。

首先，就國際因素而言，以下列幾點可最為關鍵：

(一) 亞洲各國對於美國運用「公平貿易」(fair trade)要求市場開放的反彈。

鑒於 1990 年代美國貿易逆差極為嚴重，美國行政當局在國會壓力下，向擁有巨幅對美順差的東亞國家喊出「公平貿易」的口號，要求亞洲國家除了向美國輸出大量商品外，也應該向美國採購商品，以資平衡。此外，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亦大幅利用國會授權的各式 301 法案向亞洲國家的提出所謂「不公平貿易」之控訴，威脅亞洲國家若不改善此不公平貿易，則將提出制裁措施，這使得各國思考要分散市場，進以減少對美國的出口依賴。

(二) 亞洲各國(如東南亞國家)對國內產業有高關稅保護。

亞洲國家在 1990 年代經濟逐漸興起，但這些國家在貿易政策上仍採取高關稅的保護措施，以扶植國內產業。為了爭取亞洲國家逐漸蓬勃的市場，雙邊及區域自貿協定變成是一可行的方法，來獲得進入這些國家的市場。

(三) 亞洲各國利用 APEC 強調的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希望減少區域貿易集團化(regional trading bloc)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1990 年代除了歐洲單一市場的形成外，1994 年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成立及 1995 年南美洲之南錐共同市場的建立，皆使得以出口為主的東亞國家十分憂慮，擔心此一席捲全球之貿易集團化的現象，將不利於其輸出及經濟發展。為遏阻此一趨勢，亞洲國家遂利用 APEC 場域來強調開放的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即強調 APEC 成員間的貿易自由化與投資便捷化，且這些措施是不以犧牲或歧視非成員國為代價，進以區隔於歐盟、或北美自貿區此種內外有別的區域經濟組織。

(四) 杜哈回合、APEC 的自由化進程緩慢，使得雙邊的 FTA 吸引力增加。

在 1990 年代初期，因杜哈回合談判亦陷入僵局，且 APEC 因強調

非強制與自願性原則，使得其在成員國間所揭櫫的自由化實施進程十分緩慢。這也使得一些國家不耐於此多邊貿易協商的進度，而決定採取雙邊 FTA 談判，以加快貿易自由化腳步。

(五) 亞洲金融危機後，促使亞洲國家加速採取經濟改革路線。

亞洲金融危機使得東亞國家警覺到美國及西方國家的不可依賴，而促使部分國家開始大刀闊斧地採取國內經濟改革措施。例如韓國的金大中總統在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即展開一系列措施來改善韓國的經濟結構與體質，其中一項即是強化韓國與他國的 FTA 聯繫，也因此韓國在 1998 年開始與智利洽談 FTA，而較其他國家在簽訂 FTA 的歷程中處於領先的地位。

(六) 新加坡對日本的 FTA 提議。

新加坡為小型的開放經濟體，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隨即在 1999 年即與紐西蘭開始進行 FTA 的談判。此外，同年新加坡向日本提出締結 FTA 的建議試探，雙方隨後開始進行相關研究磋商。之後在 2000 年代初期，中國大陸開始積極與東南亞國家締結 FTA，使日本甚感不安，而促使日本也開始努力轉向東南亞國家簽訂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山澤逸平, 馬田啓一 et al. 2012, 木村福成 2012)。

另一方面，下列幾點的國內因素亦影響著日本對於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的態度：

(一) 日本在 1980 年代與美國貿易摩擦時痛苦協商的經驗。

日本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在 1980 年代最為嚴重，當時日本貿易談判代表在美國龐大的政經壓力下，經常不得不做出痛苦的退讓。此一不愉快的經驗也使得日本對於雙邊貿易談判，特別是與美國談判，經常抱持著敬謝不敏的態度。而後來 WTO 之多邊貿易組織的成立，也使得日本談判官員更傾向於多邊談判而勝於雙邊的貿易磋商。

(二) 日本政府內通商產業省(經濟產業省之舊稱)之通商政策局，及外務省之國際經濟局皆採取 WTO 至上主義的立場。

通產省(通商產業省簡稱)的通商政策局是主導日本對外貿易政策的主管單位，相較於雙邊 FTA，該局的態度更傾向是多邊的 WTO，主要原因是 WTO 多邊的談判可為日本企業獲得更大的市場，而具有較高的效益。同時，WTO 的成功也可遏阻歐美貿易集團化的趨勢。當時外務省主管國際經濟事務的國際經濟局亦是採取相同的立場，認為日本應專心致力於 WTO 的談判，而不應分心於區域或雙邊貿易協定，因為這將對日本在 WTO 內的聲譽有負面影響。

(三) 日本國內農業敏感度高，無法達到 FTA 要求的開放程度，因此日本政府認為無法達成 GATT 第 24 條規定之實質全部的貿易自由化的要求。

由於日本農業的保護程度高，FTA 對於開放的要求相對嚴格，因此如果簽訂 FTA，勢必將開放農業部門，而將會對日本農業造成嚴重的衝擊。日本政府內部評估，該國農業尚無法接受此一開放的後果，因此，簽訂 FTA 被評估為是實際上不可行的作法(馬田啓一 2012)。

(四) 國內有自民黨強烈要求農業保護的農林族議員，反對 FTA 的簽訂。

由於上述 FTA 對於自由化程度的要求，因此日本的農業團體及農民大多反對 FTA 的簽訂，深怕 FTA 簽訂後將嚴重衝擊日本農民的生計與發展。此一恐懼也轉化成為政治壓力向自民黨內的農林族議員施壓，這使得自民黨內為數眾多的國會議員堅決反對 FTA 的簽訂(管原淳一 2012)。

(五) 日本產業界較重視 WTO 而對 RTA 持否定的態度(如經濟團體連合會)。

此外，日本產業界對於區域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興趣遠低於促成全球貿易市場開放的 WTO，這也使得原本應支持自由貿易的日本產業界，將其關注焦點全部放在 WTO，而忽視雙邊及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田代洋一 2013)。

(六) 日本對於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主義持反對的態度。

相較而言，日本製造業產品極具競爭力，需要的是更開放的國際市場，因此對於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之成立所代表的貿易集團化之區域保護主義，甚為憂慮。日本認為這些區域貿易集團的興起將有礙於日本產品對這些區域內國家的輸出。因此，日本政府對這些貿易集團所代表的區域主義抱持反對的立場，這也使得日本不會違逆自身立場而致力於簽訂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

總言之，上述的國內因素與國際因素導致了日本在 1990 年代對於區域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保留態度，但這些因素在後來因國際時空環境的改變，也促使了日本之後對 FTA 態度的轉向。

另一方面，截至 2014 年為止，日本僅簽了十三個雙邊自貿協定，如表 1 所示。在區域整合上，日本無論是在 TPP、或是在由東協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及中日韓三邊自由貿易區(CJK FTA)制定推動的態度上，向來都不是扮演主導者的角色。

表 1 日本簽署的 EPA 現狀、共簽署 13 國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新加坡													
墨西哥				x									
馬來西亞					x								
智利						x							
泰國						x							
印尼							x						
汶萊							x						
東協							x						
菲律賓							x						
瑞士								x					
越南								x					
印度										x			
祕魯											x		
澳洲													x

資料來源：日本外務省網站。

如前所述，由於日本在國際貿易體系上向來偏重全球層次的貿易自由開放，使得日本政府向來將重心放在以 WTO 的多邊談判與磋商上，希望有效的在全球層次上解決國際間的貿易壁壘與障礙，而使得有廣泛海外市場及強大競爭力的日本企業皆能因此受惠(閔沢洋一 2008)。

然而，由於 WTO 在近年來所進行的杜哈回合談判(the Doha Round)陷入膠著而延宕，並在 2012 年底由於 WTO 各成員國仍無法達成共識，而正式宣告杜哈回合的談判失敗。有鑑於 WTO 近年來的成效不佳，使得日本政府與相關官員的目光，開始逐漸將區域整合及雙邊自貿條約，並期待藉由這些區域經濟整合組織的加入與建立，來進一步擴大日本海外市場。

最早象徵日本貿易政策從注重多邊的 WTO 逐漸轉向的第一次試探是 1998 年 11 月墨西哥總統福克斯(Fox)向日本提出締結 FTA 的提案，後由日本貿易振興會(JETRO)及墨西哥商工振興省偕同展開 FTA 的共同研究。

另一個轉向的徵兆是在 1999 年 5 月通產省所發表的平成 11 年通商白書。該報告開始對區域整合(日文稱地域統合)採取較為正面的評價，認為其對於多邊貿易體系之強化做出貢獻，且有其必要性。此可說是區域貿易主義的重要性首次獲得通產省的承認。

除政府之外，更重要的是日本民間產業界呼應的意見。1999 年經團連亦對 FTA 的立場做出重大改變。一除過去否定 FTA 的立場，經團連開始認為 FTA 將助於促使多邊貿易談判的實現。此一政府與民間開始轉變風向的氣氛，在 1999 年 12 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向當時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提出締結 FTA 提議時達到成熟的時機。

然而，當時通產省內對此提案持正反意見皆具。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與新加坡締結 FTA 對日本所帶來的利益不大，此外，他們也擔心日本與新加坡簽訂 FTA 對日本在推進 WTO 的努力上將帶來不利的影響。此一議題在通產省內部意見分立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該省內部之 WTO 交涉擔當部局與 FTA 推進部局兩個單位間的深刻對立。最後，該省仍決定仍朝此 FTA 簽訂邁進。

於是，2001 日本政府開始與新加坡展開談判交涉，2002 年兩國正式簽署 FTA，此遂成為日本第一個簽署的 FTA (EPA)。然而，實質上，由於新加坡的經濟規模小，日星 EPA 僅具象徵意義，但是日本在 2004 年與墨西哥簽署的 EPA 則具實質意義。

在繼新加坡的 EPA 後，經產省負責 FTA 的局處遂選定墨西哥為日本簽訂 FTA 的下一個目標。日本政府的考量是，其欲藉由墨西哥作為的 NAFTA 會員國的身分來進入美國市場。另外，有鑑於墨西哥與歐盟也簽有 FTA，與墨西哥簽訂 FTA 將有利於日本企業同時進軍美國與歐盟。但另一方面不利的影響則是，日本必須相對應地開放部分農產品市場，而此一開放估計將造成農產品損失 3951 億日圓(關沢洋一 2008)。

再者，2001 年 10 月中國大陸宣布與東協在 10 年內簽訂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此一宣布，使得當時在東亞與中國大陸處於競爭態勢的日本政府備感壓力。由於當時日本政府是在小泉純一郎領導下，與中國大陸關係惡劣，因此中國大陸對東南亞國家的積極作為，使得日本充滿著危機感，這也使得日本國內反對 FTA 的聲音減少。

另外，關於日本政府最為關切的農產品議題，有鑑於日本在與新加坡談判時，自民黨農林水產物貿易調查會已提出要求，指出在有關農林水產品的關稅，於兩國協定談判中必需要確立不可撤廢的基本方針，藉此以避免國內農民團體的反彈，並且讓此原則持續作為之後日本政府在洽談 FTA 時有關農產品的應對方式。

如前所述，在墨西哥向日本提出簽訂 FTA 的提議後，於 2002 年 11 年兩國開始展開談判，墨西哥要求日本對農產品全部關稅在 10 年內全部廢除，日本則提出墨西哥農產品輸入額 90%以上免稅的提議，在經過兩國多次談判交涉後，兩國終於在 2004 年達成協議，此也成為日本第一個有實質意義的 FTA，而奠定日本後來陸續簽訂 FTA 的基礎。

由上可知，日本政府向外簽署 FTA 與 RTA 的政策制定上是扮演的主導的角色。然而，致使日本政府過去對簽訂 FTA 採取保守態度的主要原因，除了是因為認為推動世界貿易組織(WTO)應是最有利於日本產業向外拓展的戰略外，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日本政府認為，由於自身對於國內農產品的高度保護，使得任何日本向外簽署 FTA 的作法將導致國內農民團體的強烈反對，而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然而，後來由於 WTO 杜哈回合談判的持續延宕，及相關鄰近國家如中國與南韓向外簽署 FTA 的積極作為，使得日本政府備感壓力，而最終決定更弦易轍，開始逐步採取對外簽署 FTA，而從對其農業部門衝擊較小的新加坡開始做起，再轉至對日本產業轉進北美市場具有戰略意義的墨西哥，而開啟日本向外開展簽署 FTA 及 RTA 的道路。

## 肆、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的歷程

日本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盟邦，美國很早就希望日本能夠加入美國主導下的 TPP。2010 年 10 月在日本舉辦該年 APEC 年會前，當時的菅直人首相即曾表達將對日本是否加入 TPP 進行檢討。然而，當時由於日本民主黨內有許多國會議員，對是否要因參加 TPP 而開放日本農產品市場，抱持慎重的態度，因此使得當時日本政府在當時未能達成共識，也沒有足夠的政治決心來加入 TPP。之後，野田佳彥繼任首相，在幾經黨內論辯後才正式宣布日本準備加入 TPP。以下詳細說明日本政府在思索決定加入 TPP 的過程。

### 一、民主黨時期的 TPP 政策

2010 年 6 月菅直人在接替鳩山由紀夫繼任首相後，成立國家戰略室，並確立所謂「新成長戰略」，其中包含「包括的經濟携帶に關する基本方針」(廣

泛的經濟合作相關之基本方針)，而將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予以具體化，並納入其中的一部分。

有鑑於美國的壓力，日本對於是否參加 TPP 不得不進行思考。在此背景下，2010 年 10 月民主黨菅直人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將對是否參加 TPP 將進行檢討研究，雖然當時多數民主黨議員對於 TPP 的高標準與農產品必須自由化的要求，表達慎重的態度。事實上，菅內閣閣員對於是否加入 TPP 出現嚴重的意見分歧。例如外相前原誠司、官房長官仙谷由人等人持贊成意見，但是如農水相鹿野及經產相大畠章宏則持慎重的立場。

由於菅內閣內部的意見不一，於是在 2010 年 11 月，菅直人首相在閣僚委員會表示，應持續積極對參與 TPP 進行相關情報收集、對國內準備早日應對，並對相關國家展開協議的準備。

2010 年 11 月由日本主辦的 APEC 領袖峰會在日本橫濱召開，並在領袖宣言中確立了 TPP 與 ASEAN-plus 皆為達成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Asia-Pacific, FTAAP)的路徑(pathways)。原本美國寄望日本可以就加入 TPP 在當時作出決定。然而，日本由於國內在野黨(自民黨)及全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JA 全中)對 TPP 中的農業自由化持強烈反對意見，這使得日本政府無法在當時宣布參與 TPP。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發生，菅內閣進退失據，不僅其民意支持度急劇下降，亦使得加入 TPP 之政策的優先順序往後推延，最後菅直人在民意支持度低落、黨內異聲紛起的窘境下，於同年 8 月宣布請辭。

繼菅直人後於 2011 年 9 月繼任首相之位的野田佳彥，在其國會演說表示，將儘早作出是否加入 TPP 的決定。然而，民主黨內對於是否加入 TPP，仍持續存在 TPP 推進派與 TPP 慎重派的兩派激烈對立。例如前農水相山田即宣稱，若野田內閣執意加入 TPP，黨內年輕議員已有脫黨的覺悟。

雖然考量到黨內反對意見，但野田首相仍在 2011 年 11 月 APEC 夏威夷峰會時表示，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推進、及亞太地區經濟整合的推展，將對

此地區帶來活力而對日本有益，進而表明日本加入 TPP 協議談判的意向，而美國隨即對日本所作出參加 TPP 意向的此一決定表示歡迎。

然而，雖然日本表明其參加 TPP 的意向，其他 TPP 成員對於日本的加入則抱持日本必須全部接受先前成員所協商而達成共識的所有條款。例如，在 2012 年 6 月才加入 TPP 談判的加拿大及墨西哥兩國，就必須同意對先前成員已談判完成的條文，採取全部接受之立場的條件，方獲允許加入 TPP 談判。此亦成為日本在逐一展開與 TPP 成員國之個別磋商時所必須接受的條件。

## 二、自民黨時期的 TPP 政策

2012 年 12 月日本眾議院舉行大選，結果自民黨大勝，這使得當時的自民黨黨魁安倍晉三重新回任首相。在安倍就任首相後，他於 2013 年 2 月上任後，即籌畫他再次出任首相後的首次訪美之行。

為克服國內反對勢力，並確保農產品不會成為日本加入 TPP 的犧牲品，2013 年 3 月 13 日，自民黨外交、經濟提攜本部及 TPP 對策委員會作出決議，表示包含農林水產領域的五大項目之「聖域」，必須予以確保，並作為日本加入 TPP 談判的前提。如上述五大聖域不能確保，日本將不排除退出 TPP 談判。

前述的五大聖域包含：米、小麥及大麥、牛肉及豬肉、乳製品、甘味資源作物。該決議確認在關稅減免上，必須給予這些品項超過 10 年期間的關稅撤除。倘若上述要求無法被接受，日本將不惜退出 TPP (神田茂 and 寺林祐介 2013)。

在稍早之前，2013 年 2 月 22 日安倍晉三即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歐巴馬會晤，他並明確對歐巴馬表明，由於他選舉前已對日本民眾做出承諾，將不會以農產品之所謂五大聖域的關稅撤除作為日本加入 TPP 的條件，因此希望能獲得美國的理解。

之後，在美日雙方領袖發表的「美日共同聲明」中表示，美日雙方皆體認到日本特定的農產品及美國特定的工業製品，在兩國間貿易存在敏感度，因此最後的結果將由兩國交涉談判來決定，並確認不會對任何一方作出關稅完全撤除的要求。此點凸顯了美國與日本彼此達成某種諒解，即美國理解日本將無法完全撤除農產品的關稅，而日本亦理解美國對特定工業產品的保護。

此點對於日本在自民黨內部是否能克服反對力量來加入 TPP 至關重要。因為以往日本國內之所以反對參加 TPP 的主因，是由於在 2011 年美國 APEC 夏威夷峰會時所發表關於 TPP 將對所有品項全部撤除關稅的聲明，這使得日本無法接受。然而，美日領袖在 2013 年初所達成的此一諒解，無疑讓日本政府找到一個途徑來說服國內反對意見，而使得日本加入 TPP 變得可能。在此點獲得具體的突破後，日本於 2013 年 3 月遂表明向 TPP 成員國通知日本決定參加的意向，並準備積極展開與現有 TPP 成員國的個別磋商。

另一方面，2013 年 4 月，日本參眾兩院共同作出決議，前述五大項目之農產品必須列為 TPP 再協議的項目，並確認必須給予超過 10 年以上期間的過渡期來進行關稅撤除，而且也再度確認必須確保前述五大聖域的關稅保護，若不能維持，則日本將不惜退出。這是繼自民黨內部作出確保五大聖域的關稅後，再一次在日本國會中進行相似決議的再次確認。

2013 年 4 月，在美國與日本的部長會議中，雙方談判代表表明，在 TPP 議題上，兩國確認對日本對部分農產品及對美國對部分的工業製品，皆存在敏感性，因此兩國須持續對相關法規及市場准入持續進行交涉。同年 4 月，在 TPP 部長宣言中表明各成員國確認與日本間的雙方協議。同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正式通知美國國會日本將加入 TPP 談判。之後，於 2013 年 7 月，日本正式加入 TPP 談判(TPP 的第 18 次回合談判)，使得日本正式成為 TPP 的第 12 個成員國，也是在 TPP 成員國中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更使得 TPP 的 GDP 總量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強。

2014年4月，歐巴馬展開其第二任總統的首次亞洲之行，第一站即抵達日本，原本期待美日在 TPP 相關議題上的歧見能在此次雙方領袖會晤前獲得解決，然而，由於雙方的立場與歧見甚深，使得在歐巴馬離開日本之際遲遲無法達成共識，也使得美日雙方領袖的共同聲明史無前例地延遲到歐巴馬上飛機前一刻才發布。該共同聲明指出，兩國已釐清雙方持續朝向 TPP 重要課題邁進的重要路徑，但仍有很多需要雙方努力。這顯示美日雙方談判代表仍無法就雙方的歧異達成妥協。

2014年5月，TPP 在新加坡舉行部長會議談判。2014年6月及8月初，美日雙方持續就農產品進行談判，雙方談判進入深水區，使得談判過程日益艱困。其後的一次談判在10月下旬於澳洲雪梨舉行，日本負責 TPP 談判的大臣甘利明仍就五大聖域中的牛豬肉議題，與美國 USTR 首席代表 Forman 展開雙邊談判，雙方表示持續對有所進展，但尚未能全部達成共識，因此談判仍將持續進行。

2014年底 TPP 成員國領袖及談判代表透過在北京舉辦的 APEC 領袖峰會的機會，於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舉辦 TPP 成員領袖會議，但最後仍未能如願在 2014 年達成簽訂 TPP 大致協議的目標。2014 年 11 月美國期中大選歐巴馬所代表的民主黨失敗，11 月下旬日本自民黨的安倍政權因日本經濟未有起色而宣布解散國會於 12 月進行大選，皆在在為 TPP 協議談判的簽訂投下變數。然而，TPP 是否能達成的最終關鍵，將還是操之在美日兩國間對彼此的利益能否達成調和。2015 年 6 月美國參議院通過給予歐巴馬政府貿易促進授權(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簡稱 TPA)，使得 TPP 在 2015 年簽訂的可能性大幅增加。簡言之，日本決定加入 TPP 的過程可由下表 2 來呈現：

表 2 日本加入 TPP 之大事紀

時 間	發 展
2010 年 10 月 1 日	菅直人首相發表演說，表明將對是否參加 TPP 談判進行檢討
2010 年 11 月 14 日	菅首相在橫濱舉行的 APEC 會議表示將對 TPP 成員國及協議談判的資訊進行情報的蒐集
2011 年 11 月 11 日	野田佳彥首相在記者會上表示，準備向 TPP 成員國進行加入 TPP 協定談判的事先交涉
2012 年 1 月~2 月	日本與當時 TPP 九個成員國進行事前協議
2012 年 4 月 30 日	在美日領袖峰會會談中，歐巴馬提出對於汽車、保險及牛肉等議題的關切
2013 年 2 月 22 日	美日在領袖峰會中發表關於雙方在 TPP 談判的共同聲明
2013 年 3 月 15 日	安倍晉三首相在記者會中表明日本將加入 TPP 協定的談判
2013 年 4 月 12 日	日本與美國結束雙方關於日本加入 TPP 協定的事前談判
2013 年 7 月 23 日	日本正式加入第 18 回合的 TPP 談判，成為 TPP 第 12 個會員

資料來源：(神田茂 & 寺林祐介, 2013)

## 伍、影響日本區域經濟整合政策的國內外因素

自 1990 年代初期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陷入長期低經濟成長的停滯狀態。為重振日本之經濟，歷屆日本首相莫不試圖振衰起敝，大規模從事國內體制及結構改革，來提振長期疲弱的日本產業發展。然而，自小泉首相以後，日本政局陷入首相年年更換的政局動盪的時期，而使得諸多的經濟改革措施往往施行不久，隨即因首相及內閣的更迭而面臨撤廢或更改的窘境。

影響日本 FTA 政策的國內外結構與環境因素所在多有，本文整理相關文獻及訪談資料，以 TPP 為例，歸結出下列幾點重要的日本國內結構性因素與國際政經戰略環境因素。

## 一、日本國內結構性因素

### (一) 為打破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必須透過簽訂 FTA 來提振產業動能。

日本經濟在經歷 1960 至 1970 年代的起飛時期後，到 1980 年代中期，被美國要求日圓升值的廣場協議後逐漸轉變日本強調對外出口的產業型態，轉而變成擴大對海外投資，日本企業在海外攻城掠地的情景。然而，此一「日本第一」的經濟榮景證明是在日本跌入經濟泡沫前的虛幻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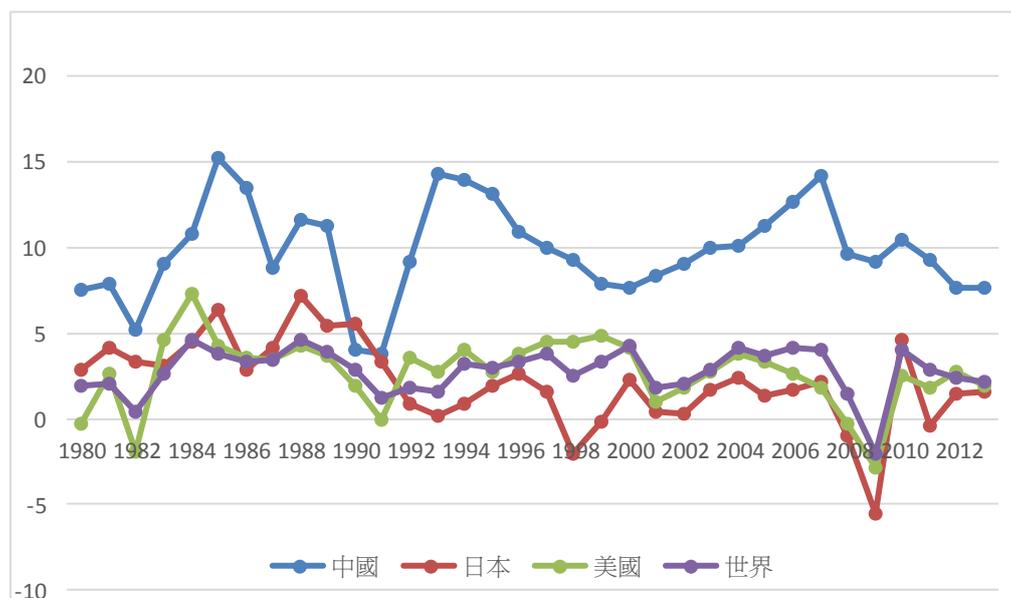
近年來，日本經濟又接二連三面臨嚴峻的打擊與挑戰。首先是在 2008 年所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此一危機使得日本的經濟成長率跌入自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的谷底，在 2009 年日本的 GDP 成長率下滑到-5.5%。在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尚未平復之下，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的東日本大地震，除奪走高達二萬條寶貴的人命外，亦對日本東北部的地方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及相關之福島核電廠核能外洩及之後日本全面禁止核電的措施，亦對日本國內經濟及出口產業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僅使得與亞洲其他國家緊密連結的生產供應鏈為之中斷，引發龐大的損失外，也使得日本國內產業必須要因核電使用的限縮所引發之產能的調整、工時的減少及用電成本的提高等，承受更為昂貴的營運成本。

對日本一般民眾而言，東日本大地震對日本產業的負面影響也連帶使得一般民眾的荷包縮水、能源用電成本更為提高、生活負擔更加沉重、及失業率上升所代表的謀職更為困難等惡化之總體經濟環境，讓一般民眾消費意願更為降低，消費需求減少引發產業生產的停滯，而不利於經濟的復甦，進而使得日本在原本即是在長期低經濟成長與通貨緊縮的泥沼中，更深地陷入此一個惡性的經濟循環中。

從日本 GDP 成長觀察，如圖 1 所示，試以日本、美國、中國大陸及世界的每年平均成長率在過去二十餘年間來觀察，日本的每年經濟成長率自 1991 年從 3.2% 下滑到 1992 年的 0.8% 後，即持續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下的經

濟成長長達將近二十年，在亞洲金融風暴的 1998 年期間下滑到-2%，在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該年經濟成長率亦下滑到-5.5%，直到 2010 年跌深反彈回 4.6%，但此僅是曇花一現。近年來經濟成長率僅仍在 1.4%~1.5% 上下徘徊。由此可見，日本經濟的不振是一項長期的問題。

圖 1 日本、美國、中國大陸及世界 GDP 成長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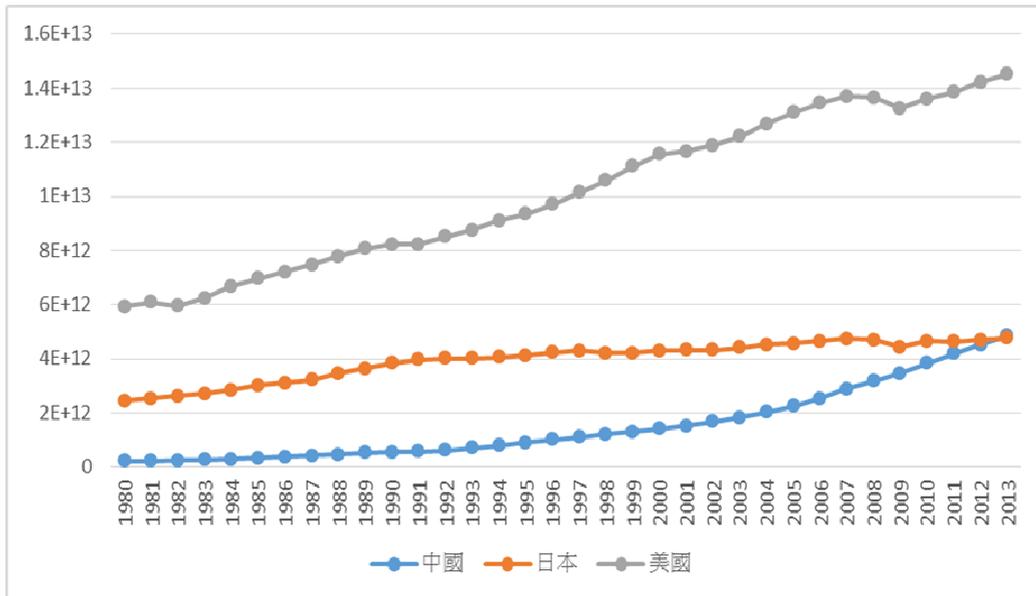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筆者自行製圖。

另一方面，從近二十餘年來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觀察，如圖 2 所示，日本自 1968 後成為世界經濟體排名第二位後，此一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經濟地位鮮少被撼動，即使是在自 1990 年代泡沫經濟後的十餘年來亦是穩坐此一全球經濟的領先地位。

然而，日本居全球經濟第二位的態勢卻隨著中國在自 1980 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後的迅速經濟成長所趕上，最終在 2010 年中國的 GDP 總額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使得日本首次跌落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從圖 5 觀察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在近二十餘年的 GDP 成長態勢可知，自 1990 年代初期以後，日本的 GDP 增長幅度即呈現相對穩定停滯狀狀態，相反地，

中國自 2001 年加入 WTO 後即開始出現巨幅的經濟增長，最終致使其在 2010 年的 GDP 一舉超越日本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圖 2 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之國內生產毛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筆者自行製圖。

此一發展的結果對日本的震撼是遠超乎經濟層面，而對日本一般民眾與政治菁英的心理及政治層面皆有莫大的衝擊。因為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自居為東亞的經濟龍頭與楷模，即使是在二次大戰戰敗後，日本仍可在短短十餘年期間即達成經濟復興的目標，並一舉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但被在近代以來被視為落後、傳統及古老的中國大陸超越，是日本所難以想像甚至接受的事實，此點更是促成日本必須加速國內改革，以振衰起敝，除以抗衡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外，更要重振日本舊有之經濟榮光，這也致使日本思考必須以進一步開放、解除管制及簽署 FTA 等方式來強化日本經濟的競爭力。

## (二) 為解決日本人口少子老年化現象所導致之國內市場萎縮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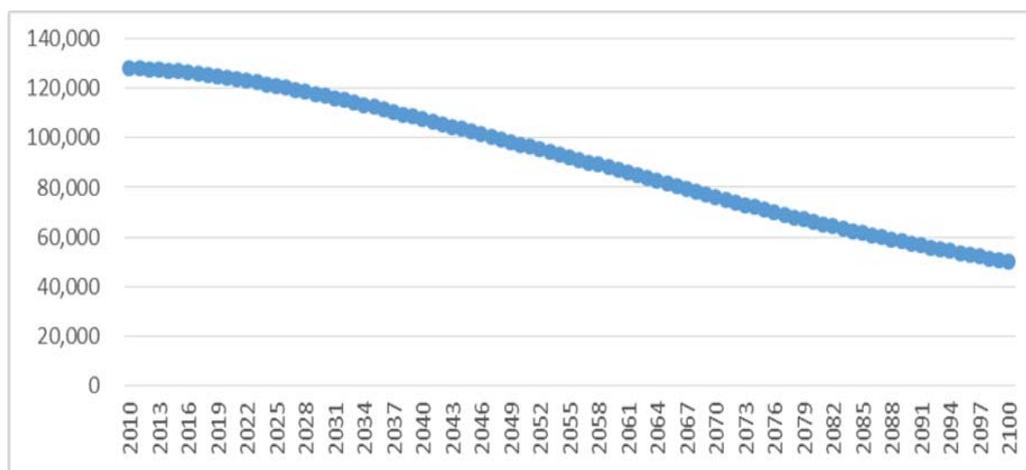
另一項致使日本經濟持續陷入低迷的國內結構性因素，即是日本人口的

持續減少及老年人口的持續增加所引發之民間消費減少、勞動生產力不足及青年人經濟負擔加重等現象所帶來的負面經濟影響。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統計推估數據指出，如圖 3 所示，日本的總人口將從目前的 1 億 2709 萬人逐年減少。倘若出生率與死亡率皆以中位的假設推估，預計日本總人口將在 2048 年減少至一億人以下，至 2057 年減少至 9000 萬人以下，到本世紀末 2100 年日本的總人口將減少到 4959 萬人。

人口的持續減少將導致勞動力的不足及消費力的降低，此將對以長期陷於經濟泥沼的日本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倘若日本政府未來不改變目前保守的人口移民政策及開放外來勞動力進入日本市場，日本未來將陷於勞動力嚴重不足而無法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困境中(渡邊賴純 2011)。

圖 3 日本總人口數之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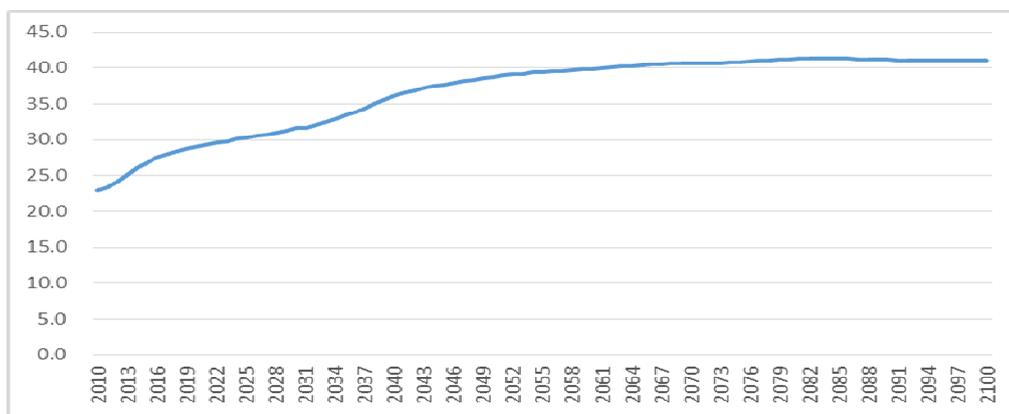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另一項日本經濟的隱憂，除日本人口總數逐年下滑外，就人口結構而言，與前者相對應而產生的現象即是日本老年人口比例的逐年攀升。

根據前述之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統計資料及推估顯示，如圖 4 所示，日本國民在 65 歲以上的人口數占日本總人口比例，從 2010 年的

占總人口 23%，如以出生率及死亡率皆以中位的假設來推估，至 2024 年 65 歲以上的老人人口比例將上升到 30%，至 2035 年此比例將攀升至 33%，亦為每三個日本人即有一位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人口。到 2060 年此老人人口數比例將上揚到 40%，此一趨勢將持續到本世紀末，預估屆時日本將面臨各項因老人人口占比過高所引發之各項社會與經濟問題，例如老人養護照顧、醫療保健支出龐大、勞動力不足、社會消費力減弱、平均勞動年齡增加導致之效率減低等現象。

圖 4 日本 65 歲以上占總人口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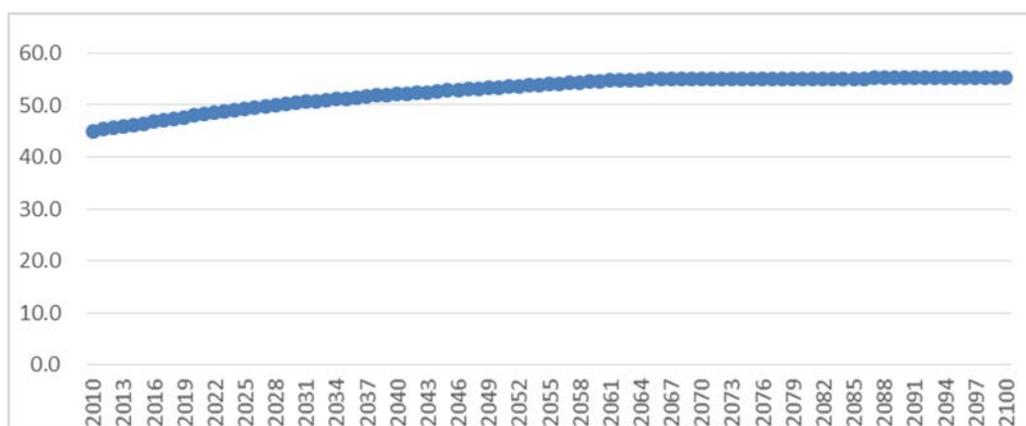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此少子老齡化現象相呼應的情況，即是日本國民之平均年齡的持續增加。根據前述之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估算指出，如圖 5 所示，日本國民的平均年齡將從 2010 年的 45 歲逐步持續增加，至 2050 年日本國民的平均年齡將到達 50 歲，此意味著屆時日本國民的平均年齡已普遍皆是中年人的狀態，至本世紀末的 2100 年，日本國民的平均年齡將到達 55 歲，此意味著日本主要的勞動力來源將無法從青壯年人來獲得足夠的補充，此對於移民政策保守而不願開放外國人來日的日本政府而言，國內所需的勞動力則必須由年齡偏高的中壯年人來承擔，對日本經濟的持續發展與成長將構成重大的隱憂。

從前述的分析可知，日本所面臨人口減少的社會問題是十分嚴峻的，且將對日本經濟帶來重大的挑戰。面對日本國民經濟成長的期待，但在人口減少之趨勢下所連帶導致之未來家戶消費支出減少、國內市場的萎縮、企業投資生產設備的意願低落、及政府承擔 GDP 兩倍的債務的情況下，要透過政府力量藉由擴大公共支出來刺激經濟，實有其困難之處。

圖 5 日本國民之平均年齡



資料來源：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

在當前高齡人口激增的未來趨勢下，社會保障及醫療保健等公共支出勢必逐年提高，而稅收又因老年人口增加及青壯年人口減少而無法有效增加的情況下，日本的財政將愈趨惡化，而致使日本未來經濟成長的可能性將更為降低。在面對此一嚴峻的人口發展趨勢下，如何進一步促成日本市場的開放與產業結構的調整，以促使經濟活動更為蓬勃、向外拓展更大的海外市場，進而促進生產能量的持續成長，則成為日本政府欲透過區域整合的參與與 FTA 的簽訂來達成其國際拓展戰略之實踐的工具(馬田啓一, 浦田秀次郎 et al. 2012)。

### (三) 簽訂 FTA 將有助於提振日本貿易及海外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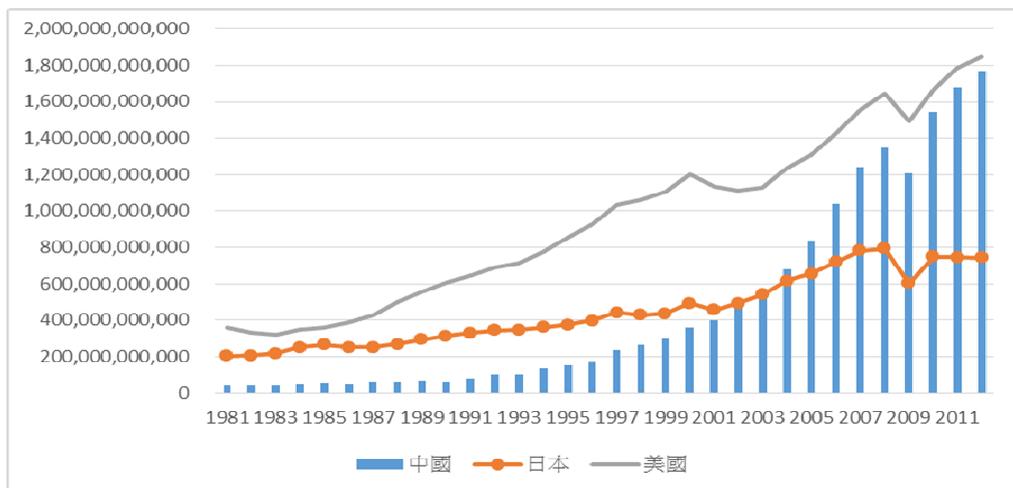
雖然一般大眾認為日本是以貿易立國的經濟大國，但事實上，日本經濟

成長的主要動能並非此來自於此一刻版印象的對外貿易，相反地，國內消費才是占日本國內生產毛額的主要來源。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日本的民間消費占日本 GDP 的六成以上。

換言之，當前安倍首相所推行之安倍經濟學中之寬鬆的貨幣政策，及機動的財政政策等措施，其中很重要的目標在於擺脫過去的通貨緊縮，以刺激通貨膨脹、鼓勵日本的民間消費，並進而促進民間企業投資，來增進經濟活絡的正向發展，並帶動國內的薪資水準，而達成國民平均所得提升之目標。

如從日本的出口貿易觀察，如圖 6 所示，出口占日本的 GDP 比例即使在日本對外貿易強勁的 1980 年代前半(在 1985 年導致日圓升值的廣場協議之前)，日本出口占 GDP 的比例也僅在 15% 上下，並非是對人口規模達一億二千多萬人之大國的經濟成長最大的貢獻來源。反倒是在 2000 年以後，日本出口占 GDP 的比重開始逐漸上升，並超越 1980 年代前半的水準，直到 2009 年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而下滑。

圖 6 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出口(貨品及勞務)占該國 GDP 比例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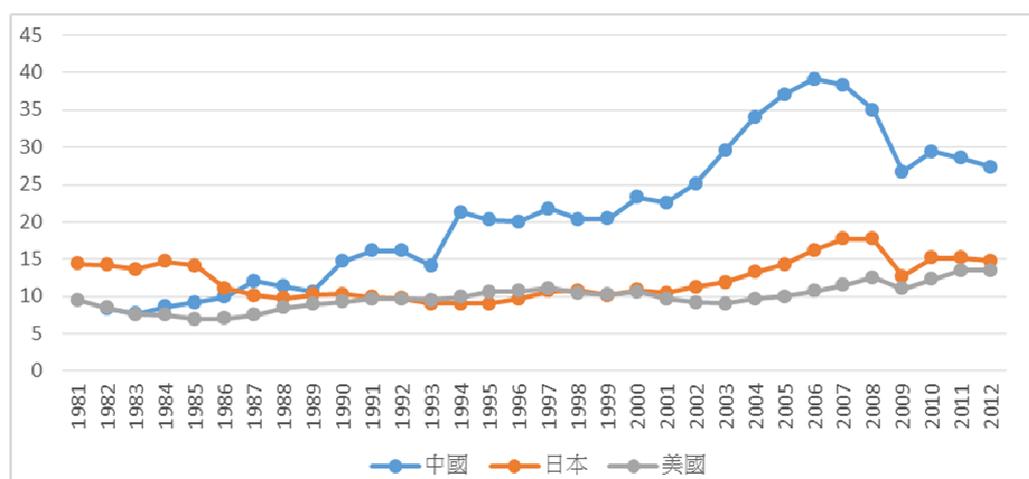
相較於日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年來的發展。如圖九所示，出口占中國大陸 GDP 的比重從 1980 年代改革開放後逐年攀升，到 2006

年中國大陸的出口占其 GDP 的比例竟高達幾乎 40%，此對一個有著人口規模高達 13 億人的國家而言，這意味著出口幾乎是該國經濟的動力來源，也意味著該國的經濟成長將極容易受到國際景氣變動的影響。

圖 7 顯示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出口總值在過去三十年的變化。很明顯地觀察到日本的出口總值雖然是呈現持續增加，但是相較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增長幅度，可說是相去甚遠。美國出口總值與日本的差距自 1985 年廣場協議後開始逐漸拉大，到 1995 年美國的出口總值已約是日本的兩倍。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的出口總值自其在 2001 年加入 WTO 後開始迅速成長，並在 2003 年中國大陸的出口總值即超越日本，而一躍成為東亞最大的出口國家，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工廠的地為因此更為確立。其後，可觀察到中國大陸的出口總值在 2009 年全球金融風暴後持續成長，目前是穩居全球最大貨品貿易出口國，而遠將日本拋乎其後。

圖 7 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出口總值(貨品及勞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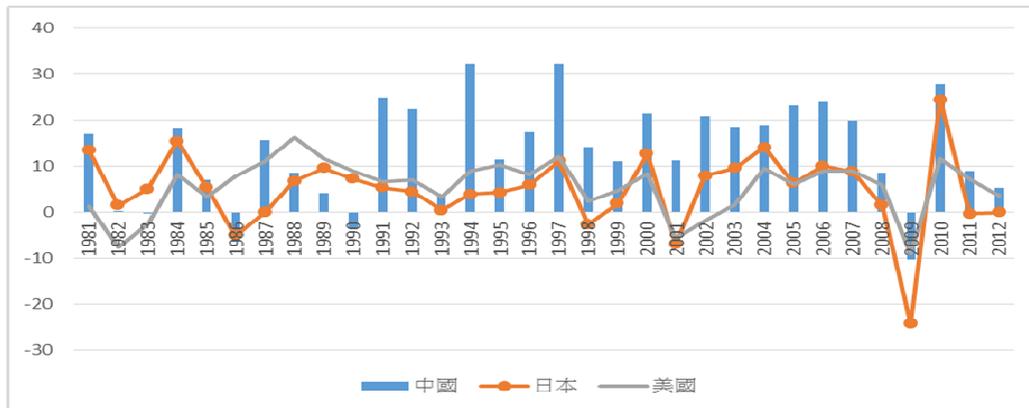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05 年美元為基準)

圖 8 顯示的是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在過去三十年來在貨品與勞務上的出口成長率。日本自 1985 年廣場會議導致日圓迅速升值後，日本的出口成長遂大幅下滑。緊接著在 1990 年代初期泡沫經濟發生後，日本的出口成長

更是一蹶不振，在 1990 年代甚至是低於美國的出口表現，而自 2002 年以後才開始有較正面的發展。然而近年來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使得日本的出口成長呈現劇烈的波動。

圖 8 美國、日本及中國大陸年度出口成長率(貨品及勞務)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總體而言，從上述貿易指標的變化觀察可知，日本作為貿易立國的根基在過去三十年來已出現的明顯的動搖。不僅日本出口占其 GDP 的比重不如以往，日本在全球的貿易出口總值及出口年增長率等指標上，雖呈現緩步增長的趨勢，但卻相對於如中國大陸的其他新興市場，明顯呈現出有限的成長，而透露出其經濟發展的瓶頸與侷限，而這也是促成日本安倍政府在 2013 年通過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計畫中，利用向外簽訂經濟夥伴協定來達成下列兩項目標，包括：(1)日本 FTA 涵蓋的貿易比率將從目前的 19%到 2018 年提高到 70%；及(2)日本中堅企業及中小企業對外輸出的金額到 2020 年時將提升為 2010 年的兩倍，藉此以全面提振日本海外貿易的競爭力與能量。一

歸結日本國內影響 FTA 的結構性因素而言，近年來日本的經濟發展因受困於國內民眾消費意願低落，在泡沫經濟後陷入長達所為失落的二十年之經濟遲緩成長的現象。日本雖然在二次戰後仰賴對外貿易迅速崛起，但是自

一 參閱 TPP 協定交渉について，內閣官房 TPP 政府對策本部，平成 26 年 6 月。

1980 年代以來其出口貿易量並非是日本 GDP 的最大貢獻來源，反倒是國內民間消費來是推動日本經濟成長的動力所在。

然而，由於日本民間的消費力道因人口減少及老化，及對經濟前景看淡等因素所影響，致使民間消費力始終低落，亦迫使日本企業一反過去僅是強調貨品輸出的營運型態，而開始積極進行海外投資之佈局。除著眼於藉由海外更便宜的勞動力與原物料來強化其國際競爭力外，亦欲透過海外投資設廠來著眼於未來新興市場中逐漸崛起之龐大的中產階級所帶來之消費市場與商機(浦田秀次郎 2012)。

為此，自 200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對外投資的金額開始急速增加，也意味日本政府在刺激國內民間消費意願的同時，其欲積極擴大日本海外市場，且致力於輔導日本中小企業的產品出口，並與日本大企業的海外布局緊密連結，從而提振日本產品的海外市場占有率，進而強化國內民眾對日本經濟復甦的信心，以達成促成正向的經濟發展之目標。區域整合的積極參與及 FTA 的簽訂對上述此目標的達成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這些政策將可有助於日本企業，特別是不黯國際貿易的中小企業，打開國外市場，降低從事海外貿易的成本與障礙，而有助於這些企業增加的海外市場的出口銷售，從而透過海外貿易的成長而刺激日本整體的經濟成長動能。

## 二、國際政經與戰略環境因素

另一方面，除日本國內因素外，影響日本政府近年來對區域經濟整合態度的因素，也包括來自於國際政經與戰略環境因素的影響，導致日本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倡議及向外洽簽 FTA。以下就兩項因素予以說明。

### (一) 中國政經軍崛起

中國在近三十餘年來的經濟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面對中國近年來的崛起，雖然日本在心理上難以調適，但也必須面對此一國力日益強大的近

鄰。對於中國的經濟崛起，日本無疑希望能夠分享其龐大消費市場所帶來的商機。因此，雖然相較於歐美國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態度與作法上皆相對保守，但近十餘年來中國亦吸收龐大的日本投資，日資企業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布局與重視已超越其他區域。

然而，日資企業亦面臨著其他國家企業較少面臨的政治風險，也即是中國民眾隨時可能被中日關係惡化所激發出的民族主義風潮與反日情緒，而連帶造成對日資企業的負面衝擊。例如在 2010 年中國漁船被日本海上保安隊扣留事件，即引發大規模的反日運動，並造成許多日資企業的損失，這也是導致再近年來日本企業考量將生產據點撤出中國而轉向東南亞國家的主要原因。

雖然中日在經濟關係上是緊密地相互依賴，但是在政治上卻經常出現齟齬摩擦之處，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經濟起飛，在國防預算上亦呈現大幅的成長，而使得其軍力的品質與數量皆大幅的提升，並使其逐漸具備足夠的實力來進行其久未行使的維護主權舉動，或稱為維權。而最明顯的地方即是中國海監船艦近年來在東海與南海地區的強勢作為。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海監船及海巡船艦在釣魚台區域與日本海上保安隊船艦的嚴重對峙，及之後中國軍方宣布東海防空識別防衛區的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幾度穿越第一島鏈的巡洋操演、日本空中自衛隊戰機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機在東海針鋒相對等事件，皆顯示中國軍方越趨侵略性而對日本不假辭色的強硬姿態。

面臨日益升高的緊張態勢，使得日本在安倍政府主導下亦強化其國土的西南防備，增加軍力以因應可能與中國大陸的軍事衝突。另一方面，安倍政府亦對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中的集體自衛權進行擴大的解釋，使得日本自衛隊得以參與美軍的相關軍事行動，增加行使自衛隊的彈性與範圍。而此類舉動在北京眼中，則被視為是日本右派試圖回覆日本軍國主義老路，加之中日雙方彼此對過去歷史認知的差異，無論慰安婦議題、日本政治家參拜靖國神

社、或是日本歷史教科書等議題，皆可成為兩國政治領導人欲強化自身政治民意基礎與煽動民族主義可資發揮的議題。

在面對中國政經軍的挑戰下，為分散日本企業海外投資營運的風險、拓展中國以外的海外市場、提振日本企業海外的競爭能力，簽訂 FTA 遂成為日本的經濟戰略選擇，特別是日本正在與歐盟談判的 FTA 及日本加入由美國為主導的 TPP，皆是具有重振以往全球經濟鐵三角的戰略意義，並達成制衡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力量的戰略意涵。

## (二) 日本 FTA 立場的轉變有助於美日同盟的再強化

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邦，日本無疑地受到美國在 2010 年宣稱之重返亞洲政策的影響。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是一項全面性的外交、安全及經濟的戰略布局，要轉變過去美國政府將政策中心過度集中在中東及中亞的失誤。

當然，美國此政策的主要焦點在於遏制中國對此區域日益擴張的影響力。因此，重返亞洲政策在軍事方面即是強化美軍對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除強化在關島駐紮的美軍外，亦宣佈未來將把 60% 的美國海軍軍力佈署在亞太地區，並在澳洲達爾文駐紮 2500 名美軍陸戰隊員，並強化與亞太美國盟邦的軍事交流，如與提升菲律賓的軍事防衛關係，及增加與亞太相關國家的軍事合作，例如與越南及新加坡等國。

就與日本的同盟關係而言，美日雙方在民主黨政府時期因為普天間美軍基地的遷移議題而發生齟齬，後來的自民黨政府上台後重新恢復將美日同盟視為是日本外交的優先與基石，並致力強化美日同盟，並爭取華盛頓對於日本政府關於集體自衛權重新詮釋的諒解。2014 年 4 月在歐巴馬亞洲之行並訪問東京時，在雙方領袖的共同聲明中，不僅美國再次重申對堅定捍衛美日同盟的承諾外，也史無前例地在共同聲明中表示對日本擁有釣魚台行政管轄權的支持，並聲明此區域是在美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美國的此一表態無疑對

中國宣稱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是一大打擊，也意味著安倍政府在釣魚台爭議上拉攏美國之策略的成功。

事實上，美國的重返亞洲政策，除軍事作為外，最重要的就是推動 TPP，並讓日本加入以使 TPP 成為一個更具吸引力而經濟規模夠大，且美國能夠主導的新興巨型區域自貿協定。也因此，美國在 2010 年日本舉辦 APEC 會議時，即希望日本能夠表態參加。

總之，日本基於其其在外交與安全上仍需依賴美日安保條約，在實際政策作為上又必須配合美國之重返亞太的政策。加之對中國政治、經濟及軍事力量日益強大之威脅的恐懼，皆使得日本不得不將加入 TPP 視為是維繫美日友誼及強化美日安全防衛關係的重要手段。換言之，日本政府對於 FTA 立場的轉變，特別是決定加入 TPP，在戰略意涵上無疑是更深化美日同盟的連結。因此，日本加入 TPP 可說是在安全、外交、經濟與戰略等因素綜合考量下的不得不然之舉，而此也凸顯日本在對外簽訂 FTA 時所受到之國際戰略環境因素的影響。

## 陸、近年台日經貿互動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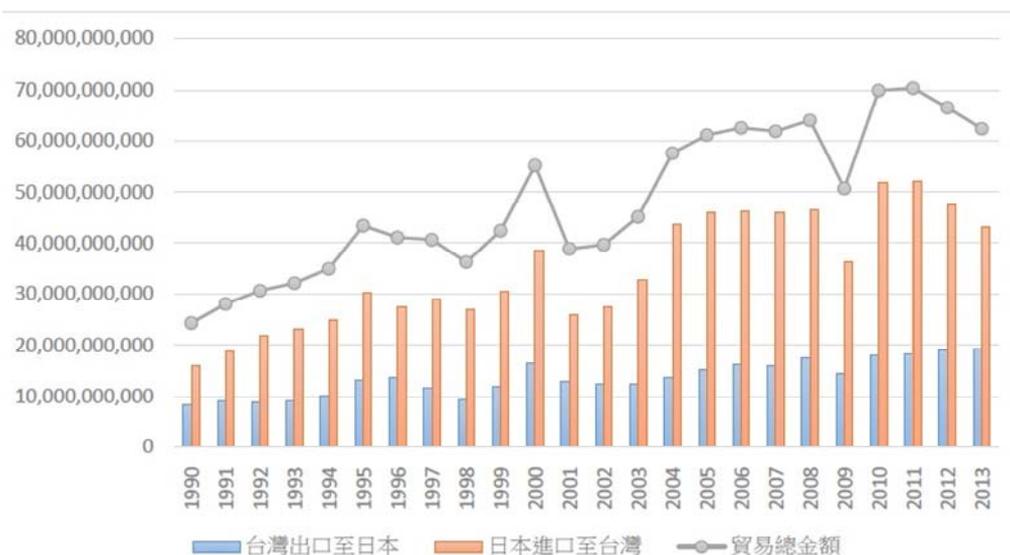
近年來，台日雙邊的經貿互動，受到全球金融風暴及 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大地震的影響，在穩定成長中仍出現一些波動。如圖 9 所示，台日雙邊的進出口貿易金額從 1990 年的 240 億美元，持續增加到 2013 年的 620 億美元，在過去二十餘年中增加兩倍多，而台日雙邊貿易的最高峰是在 2011 年，來到 704 億美元的貿易量。

在此其中，台灣對日本的出口貿易金額也持續的成長，從 1990 年的 83 億美元逐步穩定地增加到 2013 年的 192 億美元，為這段期間內最佳的表現。另一方面，日本對台灣的進口金額，亦從 1990 年的 159 億美元，持續擴增到 2013 年的 431 億美元，增加了近 2.7 倍。在此期間，日本對台灣出口的最

高峰在 2011 年，當年度日本對台灣出口金額達 521 億美元，是當年台灣對日本出口金額 182 億美元的 2.8 倍之多。換言之，在過去二十餘年間，台日貿易往來雖然密切，但台灣對日本的巨幅貿易逆差始終沒有改變，而且此貿易逆差的金額與幅度仍持續地擴大而沒有縮小的跡象。1990 年台日之間的貿易逆差也僅有 76 億美元，但到 2013 年，此台日貿易逆差擴增至 239 億美元，增加三倍之多。

而這段期間中，台日貿易逆差最為龐大的高峰是 2005 年 309 億美元。雖然台灣對日本貿易逆差不見緩和的跡象，但由於日本對我輸出多為電子電機設備及零組件產品，是在全球供應鏈下我國廠商必須仰賴作為產業鏈上游的日本產品來作為我國廠商進一步出口產品的物資。因此，此一貿易逆差關係實為國際產業分工下的供應鏈上下游的連結。然而，即使如此，雙方過於失衡的貿易關係仍將不利於長遠的台日經貿發展。因此。我國日後如欲進一步強化台日雙邊的貿易關係，如何強化我國廠商的對日出口應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圖 9 台日雙邊進出口貿易金額(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再者，再從台日雙邊的貿易對手國觀察，如表 3 所示，在 2013 年台灣的前十大貿易出口國中，日本對台灣的出口重要性已逐漸地下滑，位居第五名，次於第一名的中國大陸、第二名的香港、第三名的美國及第四名的新加坡。對日本出口的貿易量僅占台灣該年度全部出口量的 6.2%，約 192 億美元。同年度台灣卻是日本的第四大出口貿易國，對台出口的貿易量占日本當年全部貿易量的 5.8%。由此可見，台灣與日本彼此對雙方出口貿易的重要性而言，可說是難分軒輊，因此更具備雙方合作互利的基礎。

表 3 台灣與日本前十大貿易出口國(2013) 單位：百萬美元

台灣前十大出口貿易國		日本前十大出口貿易國	
1.中國大陸	81,787(26.7%)	1.美國	134,503.7(18.8%)
2.香港	39,433(12.9%)	2.中國大陸	129,155.5(18.1%)
3.美國	32,565(10.6%)	3.南韓	56,572.3(7.9%)
4.新加坡	19,517(6.3%)	4.台灣	41,644(5.8%)
5.日本	19,222(6.2%)	5.香港	37,374(5.2%)
6.南韓	12,077(3.95%)	6.泰國	36,0149(5%)
7.菲律賓	9,773(3.2%)	7.新加坡	20,976(2.9%)
8.越南	8,925(2.9%)	8.德國	18,941.9(2.6%)
9.馬來西亞	8,184(2.68%)	9.印尼	17,004.7(2.4%)
10.泰國	6,336(2.07%)	10.澳洲	16,968(2.4%)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及日本 JETRO。

另外，再從台日間雙方出口貿易的前十大產品觀察，可更進一步了解台日雙邊貿易的結構。如表 4 所示，從我國向日本出口的前十大產品分析，可知我國對日本市場輸出的主要大宗產品多為電機設備及零件，其比重在 2013 及 2014 年皆約四成左右，其次則是相關的機器與機械用具，約占 10% 左右。工業製造品仍占我國對日輸出的絕大部份貿易額，因為我國農產品的對日輸出排名第九，僅占我國對日輸出總額約 2%。有鑑於台灣農產品的高品質與口碑，日後倘若我國與日本簽訂如 FTA 的自由貿易協定，將對我國農產品在日本市場的拓展有莫大助益，因此，我國農產品輸往日本在未來仍具有廣大

的發展空間。

表 4 台灣對日本出口前十大產品

排名	HS code	產品分類	2013 年	比重	2014 年 Q1	比重
1	85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8,112	42.20	2,982	38.34
2	8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	1,722	8.96	780	10.03
3	39	塑膠及其製品	1,383	7.19	582	7.48
4	72	鋼鐵	682	3.55	324	4.16
5	90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	752	3.91	318	4.09
6	38	雜項化學產品	555	2.89	275	3.54
7	73	鋼鐵製品	605	3.15	252	3.24
8	87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579	3.01	238	3.06
9	03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391	2.03	185	2.38
10	29	有機化學產品	355	1.85	170	2.1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另一方面，如就日本對台灣的前十大出口產品觀察，如表 5 所示，我國對日本進口的產品也主要集中在電機設備及零件項目，在 2013 及 2014 年皆占有約 20% 的比重。其次則是屬於機器機械設備項目，占日本對我該年度進口約 17%~19% 的比重。其他項目則多以光學、精密儀器、塑膠、鋼鐵、汽車、化學等產品，遍及製造業的各項領域。由此可知，我國對日本的進口需求，如從進口金額的比重而言，則多屬我國製造業所需之生產設備與零組件。換言之，我國產業對日本產品的需求是以製造業上游的設備生產器具及為進行下游產品製成輸出的零組件為主。此連結反映了台日產業間在東亞跨國供應鏈下的產業分工現象。

表 5 日本對台灣出口前十大產品

單位：百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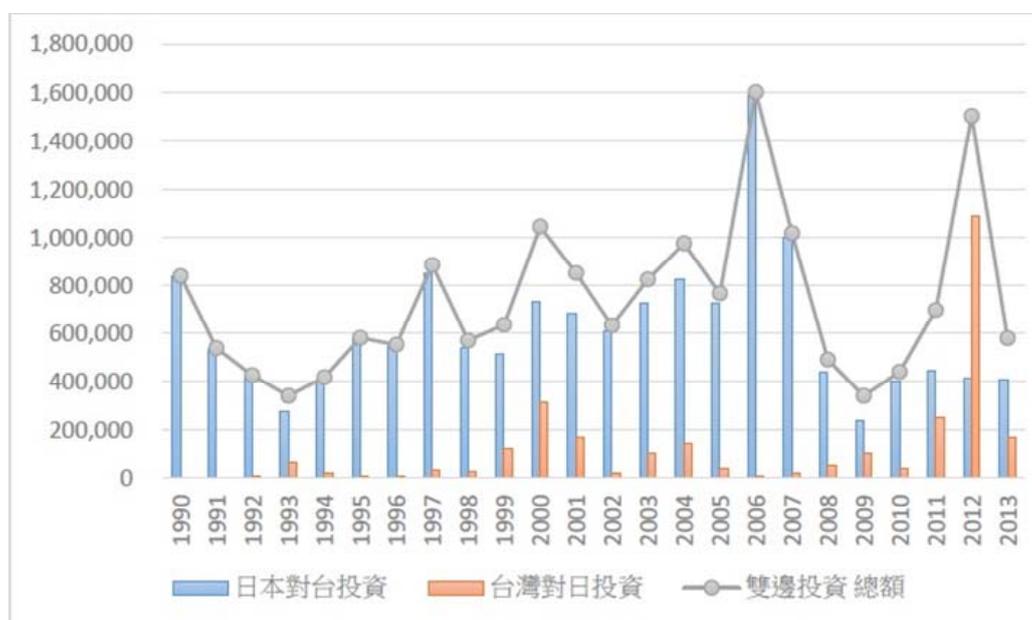
% 排名	HS code	產品分類	2013 年	比重	2014 年 Q1	比重
1	85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	9,290	21.52	3,273	19.32
2	84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	7,201	16.68	3,185	18.80
3	90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	2,640	6.12	1,204	7.11
4	39	塑膠及其製品	3,153	7.30	1,186	7.00
5	72	鋼鐵	2,831	6.56	1,072	6.33
6	87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2,118	4.91	882	5.21
7	38	雜項化學產品	1,964	4.55	849	5.01
8	29	有機化學產品	2,586	5.99	847	5.00
9	74	銅及其製品	1,735	4.02	646	3.82
10	37	感光或電影用品	1,004	2.33	422	2.49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除台日雙邊緊密的貿易互動外，另一可觀察的重點是台日間的投資關係。如圖 10 所示，台日間的雙邊投資基本上較台日間的雙邊貿易呈現一個更不均衡的現象—即日本對台灣投資的金額遠大過台灣對日本投資的金額。此處所言的投資是指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意指目的在於長期持有而在該國從事於生產製造活動的資本投入，與著眼於短期獲利的間接投資(portfolio investment)不同。就此項目而言，由圖 10 可看出，在 1990 年日本企業對台灣是直接投資金額高達 8.3 億美元，當時正是日幣升值及日本泡沫經濟的高峰，因此日本對外投資活動興盛，對台灣投資金額亦屢創新高。然而自 1990 以後，泡沫經濟崩潰，日本對台灣的投資及逐年下滑，至 1993 年跌到谷底，當年僅有約 2.7 億美元的對台投資。之後日本對台投資逐漸上升，到 1997 年為另一高峰，達 8.5 億美元，回復到 1990 年的水準。

然而，隨即面臨 1997-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日企對台投資亦隨之下跌，但在 2000 年後逐步復甦，並在 2006 年創下日本對台灣投資的歷史高點，當年日企對台投資金額共達近 16 億美元，但之後受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逐年下滑，日企對台投資金額在 2009 年跌入此二十多年的谷底，僅有 2.3 億美元。近四年來受到日本 311 大地震的影響，日企開始尋求海外布局以分散營運風險，日本對台投資的金額因而有回溫的現象，但仍僅在每年約 4 億美元的投資金額，因此仍有許多可以再強化的空間。

圖 10 台日雙邊投資金額(千美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103 年 9 月統計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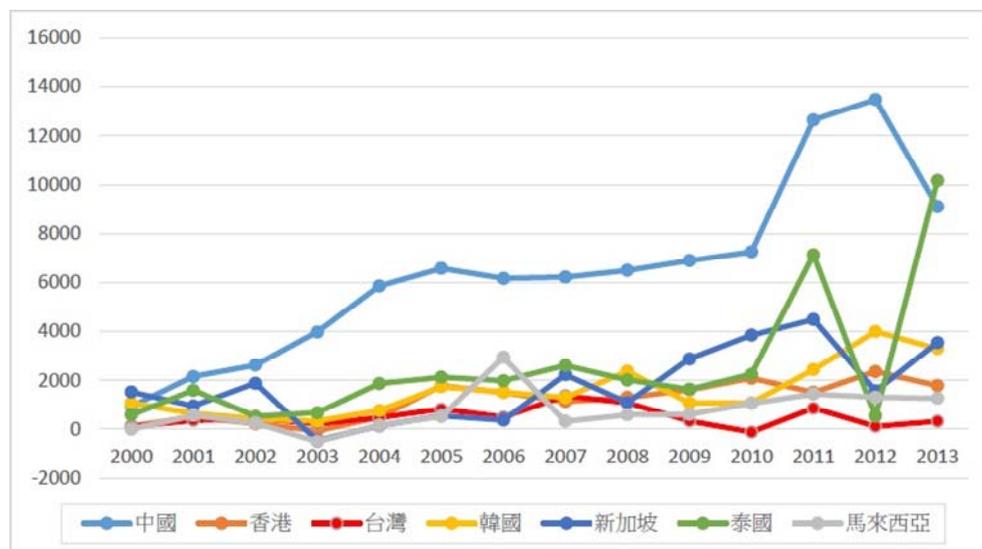
更進一步說，如從日本企業對亞洲地區的投資分布觀察，如表 6 所示，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金額在日企於全亞洲的布局中，是相對的薄弱。此現象可從圖 11 中更明顯地看出。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金額落後於日本對其他東亞國家的投資金額，此現象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更為明顯。

自 2009 年以來，在日本對外投資的中國大陸、香港、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及台灣共七個地主國中，日企對台灣的投資金額一直是呈現

墊底的狀態。日本企業在過去十餘年中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金額最高，直到 2012 年一直是保持上升的態勢。直到 2013 年才因為中日關係的緊張惡化，導致日資企業開始轉向前往其他國家，以分散風險，致使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急速下滑。而相對應的，日資對泰國的直接投資金額在 2013 年大幅地反彈上揚，除反映在 2012 年因為泰國水災所導致的投資金額下滑的跌深回復外，部分的因素也是由於日資對於中國大陸投資的轉向所導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日資企業對中國大陸投資的轉向，但卻並未對台灣的投資有明顯的增加。箇中原因除了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投資優勢本來就有所差異，另一方面，政府所預期透過更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例如海峽經濟合作協定的簽訂)來吸引外資進駐，但就日本的例子而言，似乎並未見到具體的成果。由此可見，我國如欲強化雙方的投資經貿關係，必須更針對日本企業的海外布局有更深入的了解，並有效結合我國企業的強項並廣為宣傳台灣的投資優勢，以有效地提振日企對台灣投資的興趣，並進而帶動雙邊的貿易關係。

圖 11 日本對亞洲各國的直接投資分布圖(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表 6 日本對亞洲地區各國之直接投資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中國	933.5477	2157.659	2621.552	3979.966	5862.601	6575.089	6169.089
香港	132.2179	496.0714	229.0755	-61.5834	490.8111	1781.562	1508.943
台灣	106.5536	361.4047	451.4585	217.0347	472.9247	827.57	491.4905
韓國	1073.889	650.4654	437.1892	332.5107	770.6114	1735.62	1517.465
新加坡	1520.946	950.6009	1883.561	457.159	138.4095	556.9921	374.7174
泰國	593.3014	1593.874	528.0182	678.2902	1867.357	2125.263	1984.232
印尼	584.9578	480.9594	306.915	484.4493	498.2751	1184.794	743.7337
馬來西亞	3.81459	570.2885	257.2981	504.236	162.5514	524.3523	2941.346
菲律賓	509.9357	274.5931	1073.883	114.0808	6.004591	441.5035	368.8987
越南	38.96939	138.9541	202.8127	230.052	128.0504	153.5839	467.4331
印度	174.667	150.4969	145.5454	124.1433	139.095	265.8793	512.4029
亞洲	2131.796	7797.096	8177.435	5028.149	10531.08	16188.2	17166.5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中國	6218.237	6495.993	6898.921	7251.687	12649.28	13479.21	9103.539
香港	1131.3	1301.468	1610.248	2085.362	1509.326	2362.201	1784.771
台灣	1373.025	1082.318	338.9224	113.147	861.6085	118.6075	329.823
韓國	1301.591	2369.265	1076.926	1084.748	2439.18	3995.894	3295.769
新加坡	2233.031	1089.091	2880.869	3845.438	4491.859	1566.069	3544.826
泰國	2607.512	2016.003	1631.863	2247.704	7133.336	546.6009	10173.91
印尼	1029.504	730.8847	483.4049	490.3867	3611.069	3810.395	3906.723
馬來西亞	325.1611	591.1873	615.7589	1058.175	1441.221	1308.451	1264.953
菲律賓	1045.148	705.1628	809.3751	513.8233	1018.738	731.4689	1241.776
越南	475.193	1097.574	562.5573	747.9988	1859.453	2569.726	3266.421
印度	1506.074	5551.199	3664.264	2863.597	2325.9	2802.102	2155.214
亞洲	19388.07	23347.51	20635.83	22131.47	39491.99	33477.42	40469.85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 柒、台日 FTA 的 GTAP 模型分析

近年來，由於台日關係逐漸的升溫，自日本 311 大地震以來，台灣人民是在東亞國家中對日本伸出援手，並提供全球最多的民間自願捐款的國家，

此台日民間深厚的情誼亦逐漸影響到日本政府，並動搖日本官方對我國態度的轉向，而促使台灣與日本在近年間陸續簽訂許多促進經貿往來的協議。

在台日關係日益緊密的同時，由於向外推動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已成為我國政府近年來致力推動的政策，與日本訂定台日經濟夥伴協定 (EPA)或自由貿易協定(FTA)亦成為我國政府積極強化對日關係的目標之一，而我國政府亦已積極探詢日方的意願。

本節之目的，在利用目前最廣泛運用於評估區域自由貿易及雙邊自由貿易條約對國家之經濟效益與個別產業的影響之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的全球貿易分析(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來進行台日雙方在未來經濟整合的模擬分析。本研究使用的是 GTAP 目前公開可得的 8.1 最新版本進行模擬。

本節擬簡要假設三個情境，進以分析各情境對雙方與相關國家的經濟影響與產業衝擊。這些情境皆以相關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所有品項之關稅降到零為假設的基礎。以下為針對三個情境所進行的分析：

#### ◎情境一：日本於 TPP 中，但台灣未加入 TPP

情境一為目前之現狀，日本已進入 TPP 進行談判，而我國尚未成為 TPP 成員。此情境即模擬未來 TPP 如果在 2015 年簽訂，而我國尚未加入，在 TPP 生效後所可能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表 7 顯示在情境一發生時，TPP 對我國及相關主要國家的影響。由表 7 可知，如果台灣被排除在 TPP 以外，且並未與 TPP 成員或其他國家簽訂 FTA 的情況下，台灣的經濟福祉將受到負面的衝擊，而對於實質 GDP 也將會產生-0.14%的負面影響，也將對台灣的貿易條件有著負面的衝擊。

表 7 情境一對主要國家的經濟影響

	經濟福祉(百萬美元)	實質 GDP(%)(變化量)	貿易條件(%)
台灣	-680.39	-0.14 (-541.28)	-0.09
日本	20524.93	0.3 (12943.5)	0.51
美國	2889.35	0 (213)	0.06
中國大陸	-6763.12	-0.14 (-5245.8)	-0.14
韓國	-1775.62	-0.15 (-1538.31)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再者，對於同為 TPP 成員的日本與美國而言，兩國在經濟福祉、實質 GDP 及貿易條件而言，皆獲得正面的增長。但由於兩國的經濟規模龐大，因此 TPP 對此兩國所反映出的正面效應就比例而言相對薄弱。另一方面，對於未加入 TPP 的中國大陸與韓國而言，TPP 對這兩國的負面衝擊充分反映在兩國經濟福祉的大幅減少、實質 GDP 的降低與貿易條件的惡化上。如以中國大陸為例，中國大陸因未加入 TPP 而將導致對經濟福祉的負面衝擊達 67.6 億美元，對韓國經濟福祉的負面衝擊亦將來到 17.7 億美元，皆遠高於台灣未加入的經濟福祉損失之 6.8 億美元。

另外，表 8 顯是在此情境一下對台灣產業部門所產生的前 12 大成長部門及 12 大脆弱部門。

關於表 8 的結果，在詮釋上必須格外謹慎，由於 GTAP 將產業分為 57 個部門，對全球 100 多個國家進行在此產業分類下的模擬。有些產業在台灣產值極小，此表只考慮產出(output)的變化量(百分比)，因此將導致有些產業，如羊毛或小麥，可能在台灣產值極小，但卻可能因相關貿易條約的簽訂導致此產業在台灣變得具備相對優勢而有較明顯的產出成長。如將此因素納入考慮，我們可刪除部分產業而識別出較合理的成長或可能受損的產業部門。

表 8 情境一下台灣之成長與脆弱部門

12 大成長部門	產出變化量(%) (output) (%)	12 大脆弱部門	產出變化量(%) (output) (%)
纖維作物	4.44	其他食品	-0.99
羊毛	2.54	油脂作物	-0.95
皮革及其製品	1.48	汽車及零件	-0.95
紡織	1.39	鋼鐵	-0.88
小麥	1.35	肉類製品	-0.87
屠宰牛肉	0.74	成衣	-0.82
生乳	0.71	木材製品	-0.54
乳製品	0.71	食用油脂	-0.49
水上運輸	0.32	金屬製品	-0.49
畜產	0.31	甘蔗	-0.4
電機及電子產品	0.23	糖	-0.4
林產	0.11	其他製品	-0.38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由此觀察，我國強勢的電機及電子產品，雖然在我國未加入 TPP 的情況下，仍因 TPP 整合導致的市場規模擴大、需求增加而獲利。相反地，我國的汽車及零件部門與鋼鐵業則可能因被排除於 TPP 關稅減免之外，而受到顯著的負面衝擊。

#### ◎情境二：日本於 TPP 中，台灣與日本簽訂自貿協定

假設在日本已經在 TPP 中，但我國與日本藉由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來強化與日本間的投資貿易往來，並進而透過此來強化與 TPP 成員國的聯繫。根據表 9 的結果所示，倘若 TPP 成立而日本為 TPP 的 12 個成員國之一，但台灣與日本簽訂 FTA，達成雙方對所有物品的全面零關稅。在此情況下，根據 GTAP 的模擬結果，台灣的經濟福祉將大幅增加達 12.5 億美元，實質 GDP 亦將增加 0.49%。對日本而言，台日 FTA 對日本亦是利多的局面。日本的經濟福祉將增加 37.8 億美元，實質 GDP 將有 0.04% 的些微成長，並將對貿易條件有著正面的影響。

換言之，台日 FTA 對於台灣與日本雙方是雙贏的結果，且是在台灣於短期內尚無法加入 TPP 時可以努力的方向。

表 9 情境二對主要國家的經濟影響

	經濟福祉(百萬美元)	實質 GDP(%) (變化量)	貿易條件(%)
台灣	1255.56	0.49 (1918.41)	-0.15
日本	3784.97	0.04 (1691)	0.15
美國	-1199.94	0 (-556)	-0.02
中國大陸	-644.83	-0.01 (-471.75)	-0.01
韓國	-370.03	-0.02 (-253.25)	-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另一方面，台日 FTA 則對於我國目前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大陸——有著負面的影響，亦將對我國的競爭對手——韓國——帶來不利的衝擊。因此，台日 FTA 或許可作為在我國加入 TPP 前，減少對中國大陸的貿易依賴，及增強對韓國的競爭優勢的另一項可行的途徑。

如就情境二下對台灣產業所產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如表 10 所示，倘若台日簽訂 FTA，則對於台灣的食品業、紡織業及電機電子業、及農產品皆將是利多。相反地，台日 FTA 則對我國較日本為之遜色的汽車產業有不利的影響，而對於金屬製品部門也將有負面的衝擊。另外，或許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高品質及單價相對昂貴的農產品，如水果，卻可能因為關稅撤除後而大舉來台，而對台灣的價廉物美農產品有不利的影響。

表 10 情境二下台灣之成長與脆弱部門

12 大成長部門	產出變化量 (%)	12 大脆弱部門	產出變化量(%)
其他食品	3.82	羊毛	-1.09
皮革及其製品	3.68	汽車及零件	-0.6
紡織	1.4	金屬製品	-0.23
木材製品	1.38	飲料及菸酒	-0.18
電機及電子產品	1.37	小麥	-0.18
食用油脂	1.21	纖維作物	-0.17
其他農作物	1.1	蔬菜及水果	-0.16
化學及塑膠橡膠製品	1.1	非金屬礦物製品	-0.1
營造工程	1.04	其他運輸工具	-0.1
非鐵金屬	0.89	米及製粉	-0.03
糖	0.61	稻米	-0.03
甘蔗	0.61	煤	-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 ◎情境三：台灣加入 TPP，與日本同為 TPP 成員

情境三為假設我國最後終於加入 TPP，而與日本同時成為 TPP 成員，進以檢視 TPP 對我國總體經濟及個別產業的影響。

根據表 11 的結果顯示，倘若我國能順利加入日本已經含括在內 TPP，而成為 TPP 的第 13 個成員，則此無疑是對我國經濟福祉、GDP 成長及貿易條件改善的最佳選擇。表 11 顯示，我國如加入 TPP 後，將對我國的經濟福祉帶來 58.8 億美元的正面效益，實質 GDP 亦將帶來 1.15% 的明顯增長，對貿易條件的改善亦將有正面的影響。再者，若我國加入 TPP，亦將對已是 TPP 成員的日本與美國帶來正面的影響。日本的經濟福祉將因我國的加入而增加 26.6 億美元，美國的經濟福祉也會因我國的加入而增加 6.6 億美元。對兩國的貿易條件亦將有著正面的影響。相反地，台灣加入 TPP 而中國大陸及韓國未加入，則會對這兩國有重大的負面衝擊。

例如台灣加入 TPP 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福祉將產生高達 138 億美元的負面衝擊，對於韓國的經濟福祉亦將產生 33.6 億美元的不利影響。對兩國的實

質 GDP 及貿易條件皆相同地會帶來負面的效應。相較於台日 FTA 對中、韓兩國的負面影響，台灣加入 TPP 對這兩國產生的不利衝擊可說是更為嚴重且巨大。

由此觀之，台灣如能加入 TPP，不僅有利於我國整體經濟福祉的提升，亦對於 TPP 主要成員的美日兩國而言，亦有正面的影響，可說是雙贏的局面。另一方面，對於我國要超越的競爭對手韓國而言，或我國欲減輕過度貿易依賴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加入 TPP 將對達成上述兩項之目的產生明顯的效果。因此，我國之首要目標仍是應以加入 TPP 為最終目的。

表 11 情境三對主要國家的經濟影響

	經濟福祉(百萬美元)	實質 GDP(%) (變化量)	貿易條件(%)
台灣	5884.4	1.15 (4524.22)	0.32
日本	26547.75	0.35 (15435)	0.69
美國	666.23	-0.02 (-3183)	0.1
中國大陸	-13811.71	-0.3 (-11148.25)	-0.26
韓國	-3360.1	-0.27 (-2873.81)	-0.18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再者，就情境三下對台灣產業產生的影響，如表 12 所示，台灣加入 TPP 後，有著明顯產出成長的部門包含紡織、成衣、化學等產業。另一方面，對台灣會有不利影響的產業，則大部分涵蓋台灣的農產品，包括牛肉、乳製品、生乳、畜產、肉類、糖、蔬菜水果、及畜產品等。由此可觀察到，TPP 對台灣造成最大負面衝擊的部門，與日本加入 TPP 的情況類似，大部分集中在農業部門，而這也是我國政府在思考加入 TPP 時，或許可向日本取法或借鏡的地方，即如何減少 TPP 對我國農業的衝擊，及透過加入 TPP 的機會來全面重振及改革台灣農業，使之更具備國際競爭力，而讓 TPP 成為台灣農業邁向國際競爭的契機，而不是台灣農業全面潰敗的起點。

表 12 情境三下台灣之成長與脆弱部門

12 大成長部門	產出變化量(%)	12 大脆弱部門	產出變化量(%)
皮革及其製品	57.2	小麥	-6.62
紡織	31.47	屠宰牛肉	-6.56
纖維作物	22.78	乳製品	-4.85
油脂作物	19.1	生乳	-4.84
成衣	15.92	畜產	-3.11
羊毛	7.78	肉類製品	-2.94
其他製品	3.15	糖	-2.74
燃氣	3.08	甘蔗	-2.7
木材製品	3.05	蔬菜及水果	-2.38
化學及塑膠橡膠製品	2.96	畜產品	-1.89
其他食品	2.79	機械	-1.4
食用油脂	2.74	非鐵金屬	-0.9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結果。

## 捌、結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是我國經濟產業升級的手段而非目的

從前述對於近年來日本對於區域經濟整合及 FTA 政策演變的分析可知，日本政府對上述兩項議題的立場，在過去十餘年來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從以往對於 RTA 及 FTA 抱持負面、保守及遲疑的立場，轉而變為對兩者開始採取正面、積極及主動的作法。此一改變的原因，如前文所述，主要是由於國內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改變，及國際政經環境趨勢的變化所導致。

筆者透過在日本研究期間對日本相關談判官員、學者及民間工商界團體與媒體記者的深度訪談，與對相關既有文獻的整理，勾勒出近年來日本對區域經濟整合與 FTA 政策的發展與演變，及影響其 FTA 政策的國內外重要因素。簡言之，近年來日本政府積極投入區域經濟整合及推動簽訂 FTA 的作法，主要肇因於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及日本在全球經濟的競爭態勢下逐漸

趨於劣勢的因素所導致，諸如中國的經濟崛起，來自韓國企業的強烈競爭，皆使得日本政府必須加緊腳步及採取必要的對應措施，以消極地避免日本競爭力的削弱，並積極地來提振日本企業的競爭力，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及向外主動簽訂 FTA 的作法，正是擴展海外市場，強化日本貿易能量的有效途徑，也因此，日本政府自 2010 年制訂新成長戰略後，雖歷經政權轉換，仍然將拓展海外貿易及向外洽簽 FTA 視為是提振日本經濟的重要途徑之一。以下筆者扼要點出日本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特徵。

首先，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及向外簽訂 FTA 並非日本政府單一的政策，而是被放置在日本整體的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如日本再興戰略, Japan is Back)中的一部份。換言之，日本政府對自身未來的總體經濟目標已有一個完整的戰略，而是將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及對外簽訂 FTA 作為借力使力地來運用成為達成其總體經濟戰略目標的一個途徑及手段。最終目的是日本經濟的再興，而不是被動地因為要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或簽訂 FTA 而來改變國內法規及產業結構。

其次、日本藉由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及簽訂 FTA 的外來壓力，促使日本產業及農業進行必要的結構改革，以因應日本因人口減少及老齡化人口增加所引發的沉重財政負擔與經濟挑戰。換言之，簽訂 FTA 的外來壓力是被日本政府巧妙地作為進行自身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動力。

第三、對於會對國內經濟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區域經濟整合，如 TPP，日本政府與政黨皆透過各自的管道與相關利益團體及民眾進行充分的溝通，並匯聚 TPP 的正反意見，且也將政黨的意見與政府不同部門間的意見彙總到內閣層級的專責機構(民主黨時期是國家戰略室，自民黨時期是 TPP 政府對策本部)來進行統合及協調。此外，對於特定具國內高度政治敏感的 FTA，如 TPP，則特別是將其提高到內閣層級，而以首相的政治高度在內閣會議上以政治決斷來進行最後的決策。

第四、日本在對外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或簽訂 FTA 的談判策略上，並未設

定明顯的優先次序，而是採取同時並進、相互為用的策略，以增加自身的談判籌碼與縱深，來合理地極大化日本在進行雙邊或多邊談判時的國家利益。

最後，日本主要工商團體皆對其成員關於 TPP 對其影響進行的確實、全面、深入的調查與研究，然後再由這些團體形成政策建議提報給日本政府相關部門。這些工商團體並非為特定政黨或政府背書而存在，而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利益團體，有獨立表達其意見的能力與意願，而能充分表達其成員的意見。如此可使日本政府真正瞭解日本產業界的意見，並擬訂適合產業界需求的 FTA 政策。

以上幾點，或可對目前因與中國洽簽的服貿爭議而引發國內強烈反彈，並處於左支右絀的我國政府，有所正面的啟發與借鏡。我國或許可效法日本再興戰略的作法，將我國對外洽簽 FTA 或其他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視為是達成我國長期經濟戰略目標的一個途徑與手段。換言之，我國並非是為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而加入，為簽訂 FTA 而簽訂，而是相反地運用 FTA 或其他區域自貿協定來達成我國欲達成的**經濟結構調整與產業升級之目標**。

換言之，我國必須對台灣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未來有一套前瞻性及全面的戰略規劃，而將此一加入區域自貿協定的風潮視為是我國達成此一目標的途徑與支柱之一。如此我國才能夠在未來的 FTA 談判中，更積極主動地提出符合我國產業利益之更前瞻性與全面性的經濟結構改革，而不僅是被動消極地防衛固守。如此也才更能夠說服國內民眾，使政府加入區域經濟整合與推展 FTA 的政策能獲得更充分的民意支持及動力來源。

## 参考資料

- 山澤逸平等編 (2012). 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FTA 政策と TPP. 東京, 勁草書屋 .
- 木村福成(2012). TPP と 21 世紀型地域主義. 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  
戦略：課題と展望 . 馬田啓一, 浦田秀次郎, 木村福成. 東京 , 文真堂:  
3-17.
- 田代洋一 (2013). 安倍政権と TPP—その政治と経済. 東京, 筑波書房.
- 石川幸一 ( 2012). 日本の FTA 戦略と TPP:日本経済の復活と成長へロード  
マ：21 世紀日本の通商戦略. 浦田秀次郎, 21 世紀政策研究所.東京, 文  
真堂: 24 -52.
- 寺田貴(2012). 日米の APEC 政略と TPP :「閉じられた地域主義」と国内政  
治 :「閉じられた地域主義」と国内政治の行方. 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  
本 :FTA 政策と TPP. 山澤逸平, 馬田啓一, 国際貿易投資研究会. 東京,  
勁草書屋: 249-269.
- 寺田貴, 三浦秀之(2012). 日本の TPP 参加決定過程. 日本の TPP 戦略：課  
題と展望 . 馬田啓一, 浦田秀次郎, 木村福成. 東京, 文真堂: 150-167.
- 浦田秀次郎(2012). TPP と日本経済の再生：課題と展望. 馬田啓一, 浦田秀  
次郎, 木村福成 . 東京, 文真堂: 97 -115.
- 神田茂, 寺林祐介(2013). " TPP 交渉の経緯と 21 分野の概要." 立法と調査  
(346): 3-34.
- 馬田啓一(2012). WTO・FTA 交渉と農業問題. 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FTA  
政策と TPP. 山澤逸平, 馬田啓一, 国際貿易投資研究会. 東京, 勁草書  
屋: 287-306.
- 馬田啓一等編(2012). 日本の TPP 戦略：課題と展望. 東京, 文真堂.

- 渡辺頼純(2011). TPP 参加という決断. 東京, 株式会社ウェッジ.
- 管原淳一(2012). 日本の TPP 参加問題. 通商政策の潮流と日本: FTA 政策と TPP. 山澤逸平, 馬田啓一 国際貿易投資研究会. 東京, 勁草書屋: 270-286.
- 関沢洋一(2008). 日本の FTA 政策: その政治過程の分析.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シリーズ. 東京,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